

《襄阳乐》源流新探

彭梅芳 戴伟华

本文通过辨析南朝清商乐曲《襄阳乐》与南朝民谣《襄阳乐歌》的关系,揭示《襄阳乐》产生的真正缘由和民俗背景;同时,尝试以《襄阳乐》为例,通过考察其制作原委、原歌辞的内容倾向以及原歌辞的流传情况去探讨南朝清商西曲歌的产生、命名以及流播的一些规律。

《襄阳乐》乃南朝清商西曲歌之一,它的产生及流变在众多西曲歌中颇为特别,其制曲因由以及以乐曲产生地作为乐曲名称的命名方式在同类西曲歌中很具代表意义。而该乐曲在后世又很受文人重视,据《乐府诗集》的收录情况统计,《襄阳乐》是被唐代诗人拟作得最多的清商乐曲之一,拟作它的诗人数量仅次于拟作《采莲曲》的人数。有鉴于此,对《襄阳乐》的产生、流变以及相关问题的探究是有一定意义的。

关于《襄阳乐》产生的缘由,历来有两种看法。对此,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收录的《襄阳乐》题解之下做了详细的交待。首先他引述了《古今乐录》的观点:“《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也。”接着郭茂倩又引述了《通典》中的一种说法:“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产为襄阳太守,有善政,百姓乐业,人户丰赡……由此歌之,号《襄阳乐》。”在这两个观点之中,郭茂倩不太认同后一说,认为“盖非此也”。其实在郭茂倩之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唐代的吴兢就曾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认为《襄阳乐》是由刘诞所造并否定了裴子野《宋略》中的说法。而两《唐书》也均认为《襄阳乐》乃刘诞创制。那么,裴子野《宋略》对刘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03页。
《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若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彦为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谓之《襄阳乐》。’盖非此也。”(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文中“刘道彦”当有误。

道产《襄阳乐》之记载是否有误?据《宋书》卷六五《刘道产传》记载,刘道产“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此外,《南史》卷一七《刘康祖传》以及《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纪六》在言及刘道产事迹时都提到《襄阳乐歌》。由此观之,襄阳百姓为歌颂刘道产而作的是《襄阳乐歌》,裴子野在记载刘道产事迹时将《襄阳乐歌》中的“歌”省略了,由此引发了争议。

《襄阳乐》和《襄阳乐歌》在字面上仅相差一字,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针对这一问题,王运熙认为:“《襄阳乐》本是歌咏刘道产政化的民谣,在刘道产时代,它还不过是一种徒歌,等到随王诞来做雍州刺史,然后把它改制为乐曲;就列于乐官的《襄阳乐曲》来说,当然是随王诞的制作了。”然而,种种迹象显示,《襄阳乐歌》与刘诞创作的《襄阳乐》当不存在改制和被改制的联系,下文试就此作一分析。

(一)就标题而言,《襄阳乐歌》和《襄阳乐》在书面上虽然相近,在《旧唐书》和《乐府诗集》中,《襄阳乐歌》甚至被简称为《襄阳乐》,但题目的相近并不一定意味两者是同源相承的。“乐”乃多音字,若《襄阳乐歌》中的“乐”和《襄阳乐》中“乐”不是同一个读音,那两个题目的差别就很明显了。据裴子野《宋略》所云,刘道产任襄阳太守期间有善政,“百姓乐业,人户丰赡”,又据《旧唐书·乐志》记载,“宋、梁世,荆、雍为南方重镇……江左辞咏,莫不称之,以为乐土”。既为“乐土”,那歌颂刘道产的歌谣当表现襄阳之和乐,则《襄阳乐歌》中的“乐”读音为“lè”似乎较为合适,即表示欢乐的意思。此外,就《襄阳乐歌》这个题目本身而言,只有当“乐”表欢乐的意思时,“歌”字的存在才有意义。相反,如果这里的“乐”是乐曲的“乐”,那“歌”字就未免多余了。至于刘诞的《襄阳乐》,根据《古今乐录》的说法,刘诞是在“夜闻诸女歌谣”后创作的,且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则《襄阳乐》中的“乐”读音为“yuè”似乎较为合适。另外,在《乐府古题要解》、新、旧《唐书》的《乐志》中均有将《襄阳乐》简称为《襄阳》的现象,这正表明此处的“乐”应表乐曲的意思,因为史书将乐曲名中表“歌谣乐曲”意思的字眼去掉的简化现象是很常见的,比如《读曲歌》和《石城乐》也可简称为《读曲》和《石城》。但如果刘诞创作的《襄阳乐》中的“乐”是欢乐的“乐”,那这个“乐”是绝不能省略的,否则会影响到该乐曲名称的完整性。可以说,刘诞创作的《襄阳乐》与百姓歌颂刘道产的《襄阳乐歌》在书面标题看似相近,意义却大不一样。

(二)就歌辞内容而言,《襄阳乐》与《襄阳乐歌》在内容上并不见得承传关系。《襄阳乐歌》的原辞虽佚,然歌辞的大致内容也并非不能猜测。据《宋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刘道产在襄阳期间政绩斐然,深得民心,蛮夷顺服,死时诸蛮夷皆备纛经,号哭追送至沔口。《襄阳乐歌》是百姓歌颂刘道产善政之作,就通常的情况来说,为古代官员所作的颂歌不外乎就是歌咏官员在任期间如何政绩昭然、勤政爱民,表现百姓受了恩泽是如何的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例如魏晋歌谣《襄阳民为胡烈歌》,歌颂的是襄阳太守胡烈的文治武功,其歌云:“美哉明后,俊哲惟凝。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振遐域。”宋代苏轼也曾作过一首《襄阳乐》,其措辞可能和当年的《襄阳乐歌》相差较大,但其内容当与《襄阳乐歌》有着相通之处:

使君未来襄阳愁,提戈入市裹毡裘。自从毡裘南渡沔,襄阳无事多春游。

襄阳春游乐何许,岷山之阳汉江浦。使君朱旆来翩翩,人道使君似羊杜。

另外,苏轼的《襄阳古乐府二首·襄阳乐》中也有这样两句:“谁言襄阳苦,歌者乐襄阳。太守刘公

《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19 页。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6 页。

《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066 页。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14 页。

王文浩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4 页。

子,千年未可忘。”这两句同样是歌颂之辞,语言就更为通俗,这对揣测当年《襄阳乐歌》的内容不无启发意义。

《襄阳乐》乃刘诞初至襄阳,夜听女子唱歌而制作的乐曲,其歌辞内容与女子所唱之歌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刘诞听到了什么样的歌谣呢?王运熙认为:“随王诞镇襄阳的时节,正是刘道产以后襄阳经群‘蛮’之乱,重趋安定繁盛的当儿,他夜中听到的歌谣当然就是从前的襄阳民谣了。”此说有其道理。然而,刘诞听到的歌曲中是否包括当年歌颂刘道产的《襄阳乐歌》值得斟酌。第一,据《宋书》卷一九《乐志一》记载:“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并列于乐官。歌词多淫哇不典正。”《襄阳乐》既被斥为“淫哇不典正”,概其歌词多涉及男女恋情、风月相思之类,则刘诞听到的歌谣当亦属于此类题材。若刘诞听到的是《襄阳乐歌》,则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襄阳乐》断不会被斥为“淫哇不典正”。第二,古代江汉一带的女子曾有一种在夜晚聚会以求伴侣的习俗,这种风俗直到唐代在一些诗人的笔下仍有反映。例如刘禹锡的《踏歌行》(《全唐诗》卷二八)就比较细致地反映了这一风俗: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
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

由诗歌描述可以看出,女郎们月下歌唱的目的是为了与其“欢”相见,这一风俗本身就具有很浓的风月情调,则姑娘们在此种情况下还大唱十六、七年前歌颂刘道产政绩的《襄阳乐歌》似乎不大可能。所以,刘诞在夜间恐怕并没有听到歌颂刘道产的歌谣,即使有,刘诞出镇襄阳时年仅十七岁,正当青春年少,对歌唱男女恋情的曲词有所偏好而对那些歌颂前人政绩的歌谣不感兴趣也是情理之中的。那么,刘诞在所听歌谣基础上制作的《襄阳乐》和歌颂刘道产的《襄阳乐歌》在内容上也就不会存在多少联系。

(三)从《宋书》关于《襄阳乐》以及刘道产政绩的记载来看,《宋书》的作者沈约并没有将《襄阳乐》与因刘道产善政而产生的《襄阳乐歌》联系起来。沈约出生于元嘉十八年(441),历仕宋、齐、梁三代。他生活在刘诞《襄阳乐》产生和流传的时代,并且认为其“歌词多淫哇不典正”,那么他极可能曾经听过《襄阳乐》原曲原辞。在南齐高帝建元初(479),沈约曾代襄阳令,则他对襄阳的人物掌故肯定会有一定的了解。从元嘉八年刘道产为襄阳太守开始算起,到南齐高帝建元初还不足五十年,像刘道产这样政绩斐然、泽被西土的人物,沈约是比较容易获得与其相关的信息的,对于歌颂刘道产的《襄阳乐歌》,沈约也当略知其内容。然而,沈约在《宋书》卷一九《乐志一》中记载刘诞制作《襄阳乐》的因由时并未提及刘道产事迹。同样,沈约在《宋书》卷六五中记录刘道产善政以及《襄阳乐歌》产生的因由时也没有提及《襄阳乐歌》被刘诞改编之事。若刘诞制作的《襄阳乐》与歌颂刘道产的《襄阳乐歌》之间确有联系,那么对此二者并不陌生的沈约为什么会只字不提?很明显,《襄阳乐》和《襄阳乐歌》之间当无联系。

二

关于《襄阳乐》的歌辞,《乐府诗集》收录唐以前《襄阳乐》歌辞九首,虽然题解中言《襄阳乐》乃刘诞之所作,但郭茂倩并不能确定这九首歌辞究竟是否刘诞当年所制的原辞。《古今乐录》认为刘诞创制的《襄阳乐》“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而现存的《襄阳乐》九首歌辞都似乎与歌和语不相关,所以这九首歌辞很可能并非刘诞所作之旧辞。逯钦立也曾曾在《先秦汉魏

《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页。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第86页。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2页。

晋南北朝诗》中指出“《襄阳乐》，随王诞作……今所传辞类与本旨不同，盖其题义虽各有所始，而词或非其旧也。郭茂倩《乐府》题下不书名氏。”然而，“今所传辞类与本旨不同”的理由其实并不能充分证明今存九首歌辞中没有刘诞当年所作的旧歌辞。翻检史书，不难推测刘诞所制《襄阳乐》的大致流传情况，今存《襄阳乐》九首歌辞中很可能仍包括刘诞制作的原辞。

(一)《襄阳乐》的本旨实难以确定，以“今存《襄阳乐》九首歌辞与乐曲本旨不同”为由来推断今传的九首歌辞非刘诞所作，并不具备充足的说服力。元嘉二十六年，刘诞刚入镇襄阳，夜闻诸女歌谣而制作《襄阳乐》，这一制曲因由与臧质制作《石城乐》的因由颇相近。臧质“尝为竟陵郡，于石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石城乐》乃《乐府诗集》中记录的最早的一首西曲歌，作于刘宋元嘉初年，当时臧质大约二十多岁。他在吴地长大，“少好鹰犬，善搏博意钱之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实乃武夫一个，以其才实难以独立创制出全新的、“声节送和”与吴声歌相异的西曲歌。那么，臧质在制《石城乐》时，若非假手，则乐曲的曲调当是参照了他所闻歌谣的节奏声调；而乐曲歌辞则可能只是对歌谣的歌词稍加改造。刘诞制作《襄阳乐》的情况与之颇为相似。刘诞出镇襄阳时年仅十七岁，此前一直在建业和广陵生活，对襄樊一带的语言及歌谣曲调知之不多。他在到镇当年就制作了《襄阳乐》，很可能是和臧质一样，在制《襄阳乐》时参照了他夜间听到的歌谣的声调、节奏和歌词。假如《襄阳乐》的乐调和歌词均是参照模仿了襄阳当地的歌谣，那它的本旨是什么就很难说了，因为若刘诞制曲时参照模仿了多首不同的歌谣，则要确定一个统一的主旨并不容易。

那么，何以见得刘诞制《襄阳乐》时参照模仿了多首不同的歌谣呢？

第一，《襄阳乐》这一带有总括性质的曲调名的命名值得注意。很明显，《襄阳乐》是因其产生的都市为名，以此类方式命名的西曲歌还有《石城乐》、《江陵乐》、《寿阳乐》等。以往论者多认为这种命名方式恰反映了南朝乐府民歌是多采自于城市都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南朝清商乐曲中，乐曲以其产生的都市命名的情况并不多见。清商乐中的吴声歌普遍被认为比西曲歌出现、成熟得早且对西曲歌有重要的影响，吴声歌在吴地产生、盛行，而犹以都城建业一带为甚。但吴声歌中却没有“建业乐”、“扬州乐”之类以都市命名的曲调。一向生活在吴地并听惯吴声歌的刘诞为什么会以一种吴声歌里所没有的曲调命名方式来命名自己创制的西曲歌呢？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刘诞模仿《石城乐》、《寿阳乐》的命名方式；二是刘诞在制曲时将他听到的不同的歌谣之歌词稍加改造，继而被之以同一曲调。不同的歌谣，其题目以及侧重表现的内容总会有差异，若为曲调取名则很难概括所有歌谣，还不如以《襄阳乐》总而概之合适。西曲歌中以其产生的都市命名的乐曲在《乐府诗集》中收录了五首，除了《江陵乐》和《寻阳乐》不能确定作者之外，其余三首乐曲均由吴地出镇西部的贵族创制。《石城乐》、《襄阳乐》这样的命名总让人感觉到作者对于乐曲产生地的一种疏离。由繁华的东部吴地出镇到相对落后的西部，贵族们在心理上会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并不属于出镇的那个地方，其真正的心理归宿仍是在吴地。例如《乐府诗集》在宋南平穆王所制的《寿阳乐》的题解中言：“按其歌辞，盖叙伤别望归之思。”《古今乐录》也记载沈攸之宋元徽五年自荆州举兵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今存《襄阳乐》歌辞中的第四首更明白地道出“乘星冒风流，还依扬州去”的愿望。因此对于当地的事物，包括歌谣他们多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的，他们将当地歌谣纳入他们制作的乐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1337 页。

《旧唐书》，第 1065 页。

《宋书·臧质传》，第 1910 页。

例如萧涤非先生认为“(南朝乐府)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若《西曲》，则其中有《襄阳乐》焉，有《石城乐》焉……皆以城名为曲调之标志，其为出于城市，实至显而易见。”见萧涤非撰《萧涤非说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49 页。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八，第 719 页，第 722 页。

曲时会对多种歌谣有所取舍,但只取其一而舍其他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一部分歌谣总会有其独有的特色。可以说,无论是臧质还是刘诞,他们均是本着吴地贵族的眼光去打量和取舍出镇地的歌谣并被之以同一乐调,再以出镇地名命名的。而正因为他们对歌谣持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在收纳歌辞时对其改动估计也不会很大,给乐曲所起的名称也是简单地以地名为曲调的标记而已。

第二,细读今存的《襄阳乐》歌辞,读者不难发现这九首歌辞的内容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来概括的。以这九首歌辞的前四首为例,其歌辞是: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

上水郎担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当江柱。

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想随否,何计道里长。

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依处。乘星冒风流,还依扬州去。

第一首比较客观地道出大堤风情;第二首则描述了沿江居民的劳作;第三首所记的大约是情人之间的对话,第四首表达的则是思归扬州的一种愿望。硬要找一个统一的主题来概括这四首歌辞恐怕只能牵强附会。其实,在《乐府诗集》所记录的清商乐曲中,一个乐曲之下的歌辞主题如此不统一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就算刘诞所作的原辞已全部散失,但如果乐曲原有一个确定的主题,后人模拟歌辞时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照应一下这个主题的。由此看来,《襄阳乐》原创时很可能就缺乏一个明确的主旨。所以,简单地以“歌辞不涉及‘襄阳来夜乐’”就推断今存九曲中恐无原辞是不具备充足的说服力的,今存九首歌辞中很可能仍然包括原辞或部分原辞。

(二) 根据《襄阳乐》流传的情况来看,曾经列于乐官的《襄阳乐》原辞应不至于散失殆尽。元嘉二十六年刘诞刚出镇襄阳,当时宋文帝刘义隆“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襄阳历来是军事重镇,在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后,人员广增且又有经济外援,则以上层将领的思想文化为主体的军伍文化此时当颇兴盛。刘诞为当时襄阳最高长官,“性恭和,得士庶之心”。他所制的《襄阳乐》又源于市井文化,则《襄阳乐》为广大守镇人员所接受并广为流传是很可能的事。北伐时,刘诞率领的军队向北曾一直攻打到弘农一带,随着其军队的推进,《襄阳乐》也可能被传播开来。元嘉二十八年刘宋北伐结束后,刘诞由于北伐有功被调回建业,后出任会稽太守,在此期间,《襄阳乐》也应该随着他的调任而传至吴地。此时社会相对安定,声色享乐之风渐盛。据《宋书》卷一九《乐志一》记载:“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此举曾被后来顺帝朝的尚书令王僧虔视为“虑乖雅体”、将为后世讥诮的不当做法。据《乐府诗集》所引之《古今乐录》所言,《襄阳乐》本身亦为西曲歌中少数的舞曲之一。同时在《宋书·乐志一》中有这样一段:“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并列于乐官。歌词多淫哇不典正。”由整篇乐志的叙述习惯来看,《襄阳乐》当是西、伧、羌、胡诸杂舞之一。且在孝武帝即位初年,刘诞助宋孝武帝刘骏平定刘义宣反叛有大功,那么,新传至吴地的《襄阳乐》此时很有可能会被“合之钟石,施于殿庭”,即便不如此,“歌词多淫哇不典正”的《襄阳乐》本身也非常符合“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的社会风尚,其传播自当广泛。同时,《襄

《宋书·竟陵王诞传》,第2025页。

《南史·刘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7页。

《宋书》,第552页,第552页。

《南齐书·萧惠基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11页。

阳乐》本源于民间歌谣,应该是广受襄阳一带民间喜爱的。襄阳处于南北通商要道上,商人既多,则《襄阳乐》亦能通过商旅传播开来。因此,刘诞所作的《襄阳乐》原歌辞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失传的。

(三) 由于刘宋中后期局势不稳以及宋齐两朝音乐机关简化,《襄阳乐》新制歌辞的收集难免受到影响,列于乐官的《襄阳乐》的歌辞应该不会有很大改变。

第一,刘宋北伐过后,无论是荆雍一带还是在吴地,局势并不稳定,伐蛮和一系列争夺王位的战争不断。动荡的局势难免使得音乐机关搜集民间乐府歌词的工作受阻。元嘉二十六年《襄阳乐》始制成,新制的乐曲本身就能满足人们求新奇的心理,估计不会马上就有人拟作新歌辞。《襄阳乐》传至吴地,虽然被列于乐官,但在吴声歌流行的吴地,一般人对“声节送和”与吴声歌相异的西曲歌其实并不太熟悉,所以拟作《襄阳乐》歌辞的人不会多。元嘉三十年到孝建元年两年间,王室夺位之争使得社会动荡,人人自危,贵族对伎乐之事难免热情减退;至于民间歌乐,特别是荆雍一带,灾害和兵乱兼有,更当衰退。因此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有心思为乐曲拟作新歌辞。在平定刘义宣和臧质反叛之后,社会暂时安定下来,在孝武帝崇尚舞曲的情况下,舞曲《襄阳乐》应该颇受欢迎,若列于乐官的《襄阳乐》有拟作歌辞添入则很可能是在此时增添的。然自刘诞反叛孝武帝被诛后,其制作的《襄阳乐》很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至少在首都一带应是如此。此后,在孝武帝刘骏执政期间,即使有人拟作《襄阳乐》歌辞,乐官恐怕也是不敢收录的。刘骏死后,刘宋朝廷再次陷入混乱的境地。到此为止,《襄阳乐》已产生近二十年了,且已被冷落了六、七年,即使刘诞叛逆的罪名已不再影响《襄阳乐》的传播,在刘宋后期“家竞新哇,人尚谣俗”的社会风气下,已是旧曲的《襄阳乐》不见得仍会流行,则有人拟作歌辞的可能性当是很小的。到了齐梁时期,人们依《襄阳乐》作辞的可能性则更小。

第二,宋、齐两代的音乐机关相对简化,与晋南渡之前相比,“并无清商专署,清乐也由太乐统辖”。据《宋书》卷三九《百官志》记载,太常官署有“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音乐机关的简化,则搜集各地民间歌谣的正常工作必然受到影响。而实际上,刘宋后期至南齐前期,掌管诸乐事的官署官员对江汉襄樊一带的乐调并不熟悉。《乐府诗集》在《估客乐》题解中曾引述《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齐武帝萧赜所作的《估客乐》歌辞云:“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萧赜游樊、邓的时间当大致在宋明帝泰始初年,当时二十多岁的萧赜曾为襄阳太守。萧赜游樊、邓时定听过当地的歌谣乐调,当他追忆往事而作歌辞,与歌辞相配合的乐调当然须贴近他当年听过的乐调才符合其心意。而由《估客乐》被归入西曲歌这一事实来看,宝月和尚所制的乐调应是流行于江汉樊邓一带的西部乐曲,他后来又献上的二曲的歌辞很通俗平易,可见他对民间流行的乐调歌谣颇为熟悉。刘瑶作为乐府令,乃是“掌凡诸乐事”的音乐人才,竟不能为齐武帝歌辞配乐,可见他对江汉襄樊一带的乐调并不熟悉。这就间接反映出一个情况,就是当时名为“掌管诸乐事”的音乐机关,对于江汉襄樊等西部地区的民间音乐搜集工作是有欠缺的。那么,就在西部地区流传的《襄阳乐》而言,即使它为人们所喜爱并在流传的过程中增添了新歌辞,这些新歌辞在刘宋后期也是难以进入乐官记录的行列的。到了南齐,即使音乐机关对搜集民乐的工作有所改进,但在崇尚新曲的社会风气下,音乐机关恐怕不会花多少力气去搜集旧乐曲歌辞。且在《南齐书·乐志》中,有这样一

《宋书》,第553页,第1229页。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第173页。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八,第699页。

“乐府令”当为“太乐令”。杜佑《通典》卷一四五《乐五》中言:“《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使太乐令刘瑶教习百日无成。”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8页。

段耐人寻味的记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连上层贵族所创作的乐曲歌词都未被列入乐官，则就算旧曲《襄阳乐》有新作歌辞，其被列入乐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而到了梁朝，颇认同“观其舞，知其德”的梁武帝自统治初年开始便听从大臣贺场的建议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命别制养德之乐”，“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正是在梁朝，包括“歌词多淫哇不典正”的《襄阳乐》在内的所有西曲舞曲舞者人数皆由十六人降为八人，这其中或透出了西曲歌渐被冷落的命运。在梁武帝之后，梁简文帝更是在《襄阳乐》之外另造《雍州曲》。《乐府诗集》将之列在《襄阳乐》九曲之下，今人罗根泽认为很可能是因为《雍州曲》的曲调是由《襄阳乐》乐调演化而来的。然其语言风格、叙述立场和角度与曲辞平易《襄阳乐》九曲甚为不同，由此也可见《襄阳乐》九首旧歌词的形式与已渐与当时乐府歌词的发展趋向相脱节，则梁朝人以旧辞形式拟作《襄阳乐》的可能性甚小。由以上论述观之，今存《襄阳乐》九首曲辞中应包括了刘诞所作的原辞。

总的来说，《襄阳乐》的产生及流变在众多西曲歌中颇为特别。刘诞夜听襄阳歌谣而制作《襄阳乐》，这种制曲因由以及以乐曲产生地作为乐曲名称的命名方式在同类西曲歌中很具代表意义。由于书面上标题相近的原因，《襄阳乐》与歌颂刘道产的《襄阳乐歌》被混淆并引发了人们对于《襄阳乐》真正由来的争论，其实若追溯《襄阳乐》和《襄阳乐歌》最初产生情形并将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就不难发现二者其实并没有多少联系。刘诞所制《襄阳乐》原辞因为制作时间的久远，长久以来被认为已散失，今存的九首唐前歌词也是后人拟作。考诸史实追寻《襄阳乐》原辞的流传状况可以发现，今存九首唐前歌辞中包括刘诞当年所制的歌辞应无疑问，不过，具体是哪首已难以确定。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元亮

《南齐书》，第196页。

《隋书·音乐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04页。

参见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